

西北民族学院建校50周年
献礼学术丛书

朱广贤
著

中国文章分类学

ZHONGGUO WENZHANG

FENLEIXUE YANJIU

研究

民族出版社

中 国
文 章 分 类
学 研 究

朱广贤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朱广贤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8

ISBN 7-105-03993-0

I. 中... II. 朱... III. 汉语-文章学-研究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326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飞龙印刷厂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第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
——西北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

西北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献礼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 任：马麒麟

副主任：艾比布拉 马景泉 李岗

委 员：郝苏民 多 识 于积贞 白 钧

曹 纯 陈自仁 马德山

秘书长：马德山

序

马麒麟

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迎来了 50 华诞。

50 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对西北民族学院来说，这 50 年，却显得漫长而极不平凡。回首已经走过的 50 年，西北民族学院人的心中，既有艰苦创业的甜酸苦辣，又有丰收后的无限喜悦！

科学研究方面的累累硕果，就是西北民族学院事业丰收的缩影。

50 年来，西北民族学院的科研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民族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培训政治干部，为民族自治地方培养政权建设人才，科学研究提不上议事日程，限制了民族学院科研事业的发展。50 年代后期，由于学校教学和民族地区建设的需要，民族学院的科学研究蓬勃开展。这期间，西北民族学院先后编纂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藏汉词典》、《蒙汉词典》、《维汉词典》，同时推出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成长起来。到了 60 年代，全国政治运动频仍，民族学院的科研活动不断受到冲击，几陷停顿。“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已有的 9 所民族学院中，有 8 所被撤销或解散，民族学院的教学科研人员大量流失，科研设备、图书资料几乎损失殆尽，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完全停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族学院陆续获得新生，科学活动逐

渐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院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老专家、老学者焕发青春，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茁壮成长，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相继问世。西北民族学院同兄弟院校一样，进入了科学研究的丰收季节。据统计，“八五”期间，西北民族学院承担重点科研项目70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民委下达科研项目14项，国家教委下达项目2项，农业部下达合作项目3项，甘肃省下达项目2项。“八五”期间，全校出版专著119部，发表论文1072篇；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励9项，获省、部级奖励77项，获地、市级奖励29项。

“九五”期间，西北民族学院的科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学院先后承担重点科研项目29项，其中国家民委下达重点科研项目10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项，甘肃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8项，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从1996年到1999年，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7项，获得省、部级奖励56项，获得地、市级奖励48项。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西北民族学院弱项的自然科学研究，“九五”期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于洪志教授主持的藏汉信息处理技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完成了藏文信息编码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学研究的丰收景象，映衬着一个人才辈出的校园。50年来，西北民族学院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格萨尔》学家王沂暖教授、藏族史专家黄备生教授、蒙古史专家谢再善教授、藏学专家段克兴教授和才旦夏茸教授、突厥学专家李国香教授、古典文学专家孙艺秋教授等，就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蜚声学界。进入80年代以来，郝苏民、杨才铭、郝慧民、却尔术、多识、王兴先、唐景福、郭卿友、梁兆年、姜溥义、李曙明、于洪志等一批教授，又以自己科研上的丰

硕成果，为西北民族学院赢得了新的荣誉。

总结西北民族学院 50 年的科研成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此，学院从近几年的科研成果中，遴选出几部学术专著，作为建校 50 周年的献礼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西北民族学院的科研园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这几部学术专著，不过是其中的一束鲜花。这些著作，大都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每本书探讨问题各异，学术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都是向学院 50 华诞献出的一份厚礼，都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由这几部专著为起点，展望 21 世纪，我们仿佛嗅到稻花飘香，仿佛看到麦浪滚滚。我们相信，对西北民族学院来说，那将是个大获丰收的世纪！

《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序

赵逵夫

8月间在合肥参加了安徽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代散文学术研讨会,会上听了一些专家的高论,会后参观时在车上曾同孙以昭、周中明等先生谈到先秦散文研究的一些问题。回来之后,有些问题还在我头脑中回旋。先秦散文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对后代文章影响甚大。从研究方面说,将专从哲学、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论著抛开不说,只解读、评析方面的论著也是汗牛充栋。可以说历来有关先秦诸子、先秦史传方面的论著都是有关先秦散文的。但先秦散文的研究还有待拓宽领域和进一步深化。我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包括地下出土先秦文献及由之引起的对先秦散文著作真伪的重新审视、篇章的分合、作者的归属、文献学的处理等);二、断代的研究(如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散文的状况分别加以研究);三、文体研究;四、地域特征的研究(如中原、齐鲁、南楚、秦地等地文章的文风特征等);五、流派研究(先秦诸子的文风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故儒、道、墨、法等不仅是思想的流派,也是散文的流派)。孙以昭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怂恿我赶快写出来。刚回校,朱广贤同志带来他的书稿《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求我作序。对文章分类学我没有专门研究,只是在考虑先秦散文文体分类问题时涉猎过一些材料,产生过一些想法。

一个民族的各种文章(包括应用文和文学作品)不仅其内容反

映了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其形式也带有民族的特征。文体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状况。但每一个时代的文体都是由过去的文体发展演变而来的,有变革,也有继承。固然,建立科学的文体学,提出能反映我国文体实际而又具有现代科学性的文体分类办法,既要当前的文体发展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要对国外文章分类方面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还须弄清我国古代文章分类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理论。这些工作不走在前面,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建树。

关于古代文体分类,近十多年已有研究的论著问世,如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读者同志们可以参看。

文章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形成是很早的。文字产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首领常常发布命令,或就某些事情作训告。于是祷辞和训告、命令等语言形式便产生。与此同时,神话故事、传说、歌谣,以及作为早期自然科学知识结晶和社会礼俗成规的谚语也都产生了。这些言辞因为使用场合与使用对象的不同,从形式到语言风格上都会有所不同,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还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说是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还不能说是“文体”。这些除歌、谣、谚以及韵文形式的祭祷之辞(如传为伊耆氏的《蜡辞》)可有的长期口耳相传,至文字产生之后被著之竹帛,有些便淹没或慢慢变形,甚至加进了后代的东西(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如《尚书·尧典》)。由口头到最早的书面语,被删除的必然很多,但后来的所谓“文章”便从这里产生。随着人们创造的文字数目的增多,文字对语言的记录功能的增强,各种文章便产生了,各种文体也随之产生。

我国古代关于文体的认识也是很早的。《尚书》中不少文章的篇名,实际上是在文体名前面加了作者的名号(也有的只以作者名号为题,个别的取篇中几字为题,乃后人所拟)。这同《尚

书》这部书取名的情形是一致的。《尚书》中的文体名称有“典”、“谟”、“誓”、“诰”、“训”、“命”^①。又《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颂”是相对于民歌（“风”）和贵族、文人的一般抒情、讽刺之作（“雅”）而言的，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其特征。由《国语》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在商代已将这些体裁相同的作品集结起来被名之为“颂”。《逸周书》、《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也存有不少先秦时不同体裁的文章，宋代陈骙的《文则》总结《左氏春秋》中的文体有八种：

“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尚书》有命十八篇）。二曰‘誓’，谨而严（《尚书》有誓八篇）。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恚（《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祷辞，自‘惟有道曾孙周王发’至‘无作神羞’，是其文也）。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

下面又一一举出见于《左氏春秋》的例子。实际上还可以补出一些，诗、歌、谣、诵这些文学体裁不算，任昉（460年～508年）《文章缘起序》中指出的鲁哀公《孔子谏》（哀公十六年），属于前人常常说到的《文心雕龙》中专篇论述的谏体；《虞人箴》（襄公四年）和见于昭公七年的正考父《鼎铭》属于“箴铭体”；《文心雕龙·檄移》指出，管仲之对楚人（僖公四年），吕相的绝秦书（成公十三年）属檄移体。根据褚斌杰先生的意见，晏子之论

① 按唐代孔颖达之说，《尚书》中的文体有10种。《尚书正义》云：“致言有本，名随其事，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孔颖达并对一些以人之名号为篇名者一一加以说明，亦分别归于以上十类之中。

“和同”（昭公二十二年），穆叔之论“不三朽”（襄公二十七年）属于论辩体；王子朝告诸侯（昭公二十六年），属于诏令体^①。则见于《左氏春秋》者至少有十多种文体。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在论及谕告、论谏、书、序、铭、谥各文体时，徐师曾《文章辨体》在论述“命”、“盟”、“书记”、“论”、“序”、“文”、“杂著”、“箴”、“铭”、“祝文”时，也多录有先秦文章为例。清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按照他自己作文的“义法”，先秦散文中“奏议类”选《战国策》6篇、李斯文2篇，“书说类”选《战国策》38篇，“诏令类”选秦始皇一篇，“碑传类”选李斯刻石文6篇，“辞赋类”屈宋之作外，并录入《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只是不及《尚书》、《左氏春秋》、《国语》和诸子之书。与上面所说到的诸书合而观之，可大略看出先秦时代文体发展的情况。

我国古代关于文体的认识和归纳概括也是比较早的。《周礼·春官·大祝》中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属、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谏”。

这“六辞”的作用既是为了“通上下、亲属、远近”，则显然只是包括应用文，其他文体如诗歌、春秋（史书）、卜辞等不在其内。而且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六辞皆为生人作辞，无为死者之事。”也就是说，大祝所掌此“六辞”，都是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上下远近的诸多关系之间，至于祭神鬼、人祇的文字，则在“六祈”的范围。《大祝》篇在上引此段文字前云：“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周礼》原文对“六祝”、“六祈”的具体名目也有说明。《文心雕龙·祝盟》云：

^① 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饌；宜社类码，莫不有文。”

刘勰则以“六祝”为六种文体。三代以前，事鬼神，重祭祀，故有关祭祀的仪式、文体分得很细。我们将此“六祝”、“六祈”都归并为一，分别只看作为一种文体，则《周礼·大祝》也应是归纳出了八种文体。这八种文体是太祝所掌，只是周代朝廷应用文的一部分。应该说，这种概括还是比较全面的。

《左氏春秋·襄公十九年》载，鲁国同齐国作战所获兵器铸为无射之钟，上面刻了铭文，臧武仲（臧纥）因此有一段论“铭”的文字，可以说是“铭”这种文体的最早的专论：

“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法而惩无礼也。”

这里对铭的内容、功用作了阐述，认为铭在天子只能是“令德”（“令”为动词，意即表彰），在诸侯只能是“言时计功”，不能将不义的行为、事件也作为铭的内容。自然，臧武仲这段论述中体现了一定的阶级立场，但也提出来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和社会教育作用的问题。

如果宋说臧武仲这段文字尚嫌简略，那么，《礼记·祭统》中有一段论铭的文字，则不仅论及内容的问题，也论及形式方面的问题：

“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昭著于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身比焉，顺也。昭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

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下面录了春秋时卫国孔悝的《鼎铭》全文，又加以评论。文中所说“铭者，自名也”几句，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所提出文体划分四原则中的“释名以章义”；举出孔悝的《鼎铭》，即刘勰提出的四原则中的“选文以定篇”；范文之前、之后的议论，即“敷理以举统”。刘勰还提出一个“原始以表时”，这里没有体现，因为这段文字本来就已论铭这种文体内容、体例的早期文献；后人论铭，则当溯于此，溯于孔悝《鼎铭》等早期作品，以体现“原始以表时”的原则。文中所说的“身比焉”，谓“自著名于下”（郑玄注），即属于格式方面的内容。

以上所引述还不是完全从文体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它们只能说是文体学的滥觞。涓涓之流，千折百合，至东汉蔡邕《独断》将天子下于群臣之文分为四类：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将群臣上于天子者也分为四类：章、奏、表、驳议。共八种朝廷应用文体（另有“宗庙乐歌”一类，此处未计在内）。还有他的《铭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文体论。曹丕《典论·论文》、范曄《世要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又各有所发展。至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则对以前文体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新的推进^①。萧统的《文选》则是当时文体分类理论的一种实践。

^① 任昉之作，本名《文章始》，《隋书·经籍志》称有录无书，则唐代已佚。惟《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则北宋以后所传，乃是张绩“补亡”之作。惟今存《文章缘起序》、严可均《全唐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俱以为任昉所作，是也。今看《序》所言与今存之正文多有不合，可知《序》非张绩补作。

上面主要是说,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些文体,古人对文体特征的认识与概括也比较早,而且在魏晋时代已形成文体学专著,到南北朝时代已产生在文体研究方面很有理论水平的著作,并且提出了文体划分的原则。

但是,一个时代的文体,同该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同一文体在不同时代其形式、语言风格上会有所不同,而且各种文体所占的主次地位也有变化,甚至于有的文体慢慢会没有人使用,而又产生出新的文体。但消失了的文体,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它的某些特征也可能体现在新文体之中;新生的文体,也非完全是新的,大多是吸收了旧有文体的部分特征,其因革流变的关系十分复杂。由于一些作者写作中的创造性,也有用此法写彼、以彼法写此以及以彼为此、以此为彼的情况。可以说,文体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各种文体间的关系也是时时处于变化之中。

由于这些原因,文章的分类总是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文章学的发展也十分缓慢,而且划分一直繁杂琐细,缺乏比较科学的归纳。如明代我国文体学上的两部著作,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前者分文体为 58 类,后者分为 120 类。

看来,我国古代很长时间内在文体划分中对文章的用途、使用场合、使用对象考虑较多,即孔颖达所谓“致言有本,名随其事”,而对文体本身的特征考虑较少,缺乏对文体特征的概括性认识。

对古今所有的文体一一列出,是不可能的。文体具有时代性,已死的和现存的并列一起,也不利于对文体发展的认识,而且古今文体之间还存在着同体异名、同名异体等等复杂的情况。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将古今文体一并加以划分,以显示其类别的特征,而又可以避免繁琐与混乱的情况?这里自然就提出—

个问题:把文体类别划分得大一些成不成?但另一方面又得考虑:如将古今的文体归为几个大类,这大类是不是还可以看作是文体?它能不能说明一种文体的特征及其流变?

从上面两个方面考虑,对文体作分级划分,是一种可取的办法。

事实上,古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已经无意识地表现出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举出八种文体,而每两体联称,归为四科,各用一个字来概括其文体方面的特征。此似可以看成作是二分法的滥觞(前两科四体为无韵之文,后两科四体为有韵之文,似其中也隐含有文笔之辨)。如果将它同稍后的陆机的《文赋》结合起来看,就更清楚了。《文赋》中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譎狂。”

分别论述了十种文体的特征,也是两句为一组,成“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与曹丕所说有所异同,但同样朦胧地体现出对文体相近者加以归类的思想。

在作品编集中采用二分法的,如果追本溯源,最早应是《诗经》一书。《诗经》中将所有作品按“风”(民歌,也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的歌词)、“雅”(用雅言所写,基本上为严整的四言诗,极少有重章叠句的情况)、“颂”(宗庙乐歌,因其配合歌舞,因此一般比较短,有一些不太讲究句式的整饬)。但“风”之中又按地域不同(唱的声调自然也不同)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

其较细的一级划分不完全是从形式上来考虑,而主要是以作品产生的地域、朝代、收集的先后为原则划分的^①。所以,这还不能说是文体上的二分法。不过,如果我们将“诗”同“赋”、“诔”等文体并列起来看,“诗”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也就是说,它已经经过分类。那么,它下面的“风”、“雅”、“颂”则应看作是二级分类。乐府(民歌)、四言诗、颂,这在南北朝以后也一直作为文体看待,而这里都归入“诗”一类,反映了编《诗》者在这一点上比后来很多文体专家还高明一些。只是由于《诗经》是一部书,人们忽略了它在文体分类上的启示意义。

萧统《文选》是二级分类,但它在各文体之下又是按内容、题材来划分的。北宋姚铉(968年~1020年)编的《唐文粹》也采取这种办法,但其“表奏书疏类”分表、书奏、疏、状四目,则是文体二分法。该书分文体为23类,其中22类是《文选》的老办法,惟“表奏书疏”类大概因为按内容题材无法分,故如此处理,没想到歪打正着,倒表现出了文体分类上的一种新的方向。

真正在文体分类上采取了二分法,而且做得比较好的是南宋时代的真德秀(1178年~1235年)。他的《文章正宗》将文体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目,每一目下再分体。其自序云: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词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观之,二书所录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辑,以明

^① 参拙文《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1期;《第二次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而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

这是我国文体分类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开创的意义。他立为四目，也可能受到曹丕《典论·论文》的启发，但主要应是他个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果，因为像“议论”、“叙事”这样的完全从形式和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高度概括的划分，此前确实还没有过。当然，真德秀的道学思想太重，他认为后世文章有脱离正统的情况，才要标举“正宗”。但我们不重其选文，只从文体学方面说，确是一个贡献。与真德秀大体同时而稍迟的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体》中对诗歌各体按不同标准，从各个方面进行分类。诗歌分类，从理论上说对散文的分类也有借鉴作用。但该书有的在同类中的划分不够严密，有任意罗列的毛病。明代冯班《严氏科谬》中说：“沧浪一生学问最得意处，是分诸体制。观其《诗体》一篇，于诸家体制浑然不知。”批评是很厉害的。由这也可以看出，古人对文章体制问题很重视。比较而言，真德秀的成绩是突出的。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类选》分文章为六大类：奏疏类、论著类、书状类、序记类、传志类、词章类。每类又分为若干目。比较起来，这种分类法对以前的文体分类法考虑较多，是传统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

此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文章为13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比储欣分得稍细一点，但比《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二书要概括得多。虽然仍是在传统分类基础上的归并，但却反映出了一级分类在一些学者的二级分类的影响下向二级分类类别靠拢的情况；清末吴曾祺编《涵芬